



戚发轫, 1933年4月生, 1956年4月入党, 1957年9月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加入中国航天事业, 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曾参加“东风一号”导弹仿制、“东风二号”导弹研制和“两弹结合”任务, 作为技术负责人之一参加“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 曾任“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首任总设计师, 在载人航天器、卫星、宇航元器件可靠性体系等工程技术领域和推动空间事业战略发展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戚发轫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与见证者。在六十余年的航天生涯里, 他践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的信念, 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为中国航天铸就辉煌。

个人意愿始终服从国家需要

1933年, 戚发轫出生于辽宁瓦房店, 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度过童年。新中国成立后, 他目睹中国志愿军被美军飞机扫射轰炸后的情景, 于是暗下决心: “一定要学航空、造飞机, 保家卫国!”

1952年戚发轫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 本以为可以造飞机, 毕业后却被亟须专业人才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要去研究导弹。当时除了院长钱学森, 国内无人接触过导弹。钱学森亲自讲授《导弹概论》, 带着年轻人恶补理论知识。

1964年6月, 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同年10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为参与者, 戚发轫倍感自豪。接着, 他又参与了“两弹结合”“东风四号”“长

戚发轫: 国家的需要就是奋斗的方向

文/记者 唐骋华 图片设计/李肇

编者按

为激励引导青少年学生热爱中国, 树立远大理想、激发学习动力、培养奋斗精神, 本报开辟“院士说给青少年的思政课”专栏, 通过记者实录, 展现两院院士求学、治学、报国的经历。他们将和青少年学子倾心交流, 回忆青春岁月, 分享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故事。

征一号”等航天任务。

1968年, 戚发轫投身卫星研制, 成为“东方红一号”卫星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此后担任“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副总师和总师, 带领团队自力更生, 解决了国家通信难题。1992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 59岁的戚发轫本可退休, 却再次响应国家召唤, 担任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既然国家有需要, 我就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离去。”他说。

1999年, “神舟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003年, “神舟五号”成功将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此后, 戚发轫回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 培养博士生, 并筹建中国首个空间羽流实验室。

“最早想造飞机, 后来搞导弹、运载火箭, 最后搞载人航天, 我的人生有好几次转变。”戚发轫说。万变不离其宗的是, 个人意愿始终服从国家需要。

一丝不苟确保十全十美

戚发轫的不服输和较真在航天圈是出了名的。

1962年, “东风二号”第一次发射失败。作为基层工程组长, 戚发轫苦苦钻研、复盘, 总结出了两条关键原则: “技术要吃透, 地面试验要做充分。”两年后, “东风二号”成功发射。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前夕, 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研制团队, 特别关切地询问卫星的可靠性及《东方红》乐曲的播放问题。戚发轫如实回答: “凡是能想到的、地面能做试验的, 我们都



图片由AI生成

(即“签字画押”)。

正是凭借这种一丝不苟、深入细节的专业精神, 他带领团队确保了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的“十全十美”。

如今, 90多岁的戚发轫仍然以严谨著称, 对博士生严格要求, 丝毫不懈怠。他的身影也常常出现在全国各地, 孜孜不倦地向公众, 尤其是年轻人, 讲述中国航天的故事, 传播宝贵的载人航天精神。问起这一生有何成就, 他总乐呵呵地说: “就三件大事——送‘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二号’和‘神舟五号’上天。”说这话时, 阳光照在他银白的头发上, 像撒了层星星。

寄语

我们现在比过去更需要航天精神的指引。当然, 航天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 而是干出来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是我们奋斗的方向。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 就是我们最应该去的地方。

无论是传统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还是载人航天精神, 贯穿其中的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因为有爱, 才能圆梦。在老一辈航天人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之后, 青年一代要肩负“从大到强”的历史使命, 做“有准备、有爱心、有梦想、有本领”的青年, 把个人理想投入国家需要、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中, 书写新时代的华章。